

文化观察

西北大地上的文学绿荫 (删节版)

——《鲁迅文学奖——宁夏作家自选集》总序

■冯剑华



张贤亮



石舒清



郭文斌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

1.

20世纪80年代初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,大江南北,春风浩荡,春意盎然,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,中国的文学同样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辉煌。一时间佳作迭出,群星璀璨,照亮了文学的天空。1980年,改刊不久的《朔方》文学月刊发表了张贤亮的短篇小说《灵与肉》,旋即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(鲁迅文学奖的前身),紧接着由著名剧作家李准改编、著名导演谢晋拍摄成电影《牧马人》在全国放映。

小说《灵与肉》的发表,以及电影《牧马人》的上演,使人们知道了偏远的宁夏有一个张贤亮,更有很多人通过张贤亮知道了偏远的宁夏。他的创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呈现出一种“井喷”状态,成为中国文坛上一位重量级的作家,其作品因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独特探索,一次又一次引起反响,影响波及世界文坛。

张贤亮是一个创作态度十分严谨的作家,这源于他对生活的独特感情和个人的精神气质。也就是说,长期生活在底层,来自劳动人民的温馨、同情和怜悯,以及劳动者粗犷的原始的内心美,给予他创作的最基本的情感因素。

张贤亮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自觉而深刻地叙写了民间的喜怒哀乐,表达了底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和温情,也深刻地体现出了一个人道主义作家高尚的情怀、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心。

作为作家,张贤亮的意义还不仅仅如此。在当下中国的文学格局中,西部文学在全国已经或者正在确立自己的地位,也正在形成自己独特的意义系统。就西部作家的创作来看,是张贤亮等人奠定了西部文学的崇高地位;就宁夏的文学创作而言,张贤亮不只是“一棵大树”,同时还是一个极具效应的鼓舞者和带动者。特别是宁夏青年作家的成长及这个群体的形成,张贤亮功不可没。

自从张贤亮连续三次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之后,在这个领域,出现了长达将近二十年的空白期。面对这样的状况,有人曾经不无调侃地说,是张贤亮拔掉了宁夏的风水。其实,就是在这许多年里,宁夏的青年作家们,凭借着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浩荡东风,沐浴着文学春天的阳光和雨露,在张贤亮等老一辈作家的影响和带动下,像一棵棵幼苗开始在文学的土壤里复苏、发芽、成长。经过艰苦的跋涉和磨砺,终于形成了以石舒清、陈继明、金瓯

等为代表的宁夏青年作家群,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曾以《遥想远方——宁夏“三棵树”》为题,给予高度评价。2001年,宁夏“三棵树”之一的石舒清,以其短篇小说《清水里的刀子》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。

2.

石舒清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回族青年作家,上世纪60年代出生于宁夏西海固的海原县。他的第一篇小说作品《回回故事》就发表在《朔方》上,至今已经有几百万字的作品面世,其短篇小说《清水里的刀子》获得鲁迅文学奖,不仅对他自己,而且对宁夏的文学界,同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。这就是在沉寂多年之后,宁夏的作家终于“梅开二度”,又有人摘取了全国的最高文学奖。对于宁夏的青年作家们,是一次不小的震动和激励。

《清水里的刀子》的成功,不仅得力于它的主题的深刻和敏锐,也得力于小说氛围的营造和故事的推演。通过对特殊情境下人与物微妙心理的探幽考微,将老人马子善与一头即将赴死的牛之间的情感叙写得看似不动声色,实则惊心动魄。清水里静静地躺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刀子,作品蒙上了一层浓浓的宗教色彩,它告诉读者,它既是清洁的,也是神圣的。这篇作品的获奖以及在文学界产生的一定程度的冲击力,表明了石舒清在创作上的一次飞跃,给以西海固为创作母土的所谓“苦难文学”以洁净的精神内涵。

石舒清的小说创作大约在经历了初期那样一种拘谨和试探之后,用崭新的勇气和对日常生活的深度思考,开始了新一轮的冲刺,创作出了一批受到读者称赞的作品,如《虚日》《早年》《农事诗》《果院》等,并且成了被各种选刊青睐的“大户”。其中的《农事诗》发表在《朔方》上,几经转载,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这篇小说传导出来的信息,我以为同样有着“宗教般的虔诚”,只不过它较之《清水里的刀子》更加超脱了,更加清洁了,因而也更加富于诗意。

3.

上世纪60年代出生于宁夏西海固西吉县的郭文斌,与石舒清年龄相差无几,又来自山川相连、人文相近的同一个地区,大约他们身上的气息也是相同的。给

人的感觉却是,郭文斌“出道”似乎晚了些,直到2007年他的短篇小说《吉祥如意》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,才引起人们的关注。其实不然,郭文斌此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致力于散文创作,而且收获颇丰,譬如他的散文集《空信封》,几次获得过全国性的散文大奖。郭文斌的小说创作大概始于新世纪之初,出手不凡。尤其是最近三年来,他发表的短篇小说几乎每一篇都被各种选刊转载,引起过不小的热评和争议。

作为从西海固农村走出来的作家,郭文斌自然也无法避免乡土对他的巨大影响。有所不同的是,他在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时,以空灵、简约、飘逸见长,使他的小说显得言简意丰、结构奇特,对人的生命价值进行着形而上的诗性追求。如《吉祥如意》,通过五月和六月两个孩子的视觉,运用端午节上山采艾的细节描写,将一种与大自然紧密相连的愉快、安详传递给了读者,同时也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反映出成长中的朦朦胧胧的伤感和无奈,展示了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生活理想和生存精神。郭文斌的小说大都采用童年视角展开叙述,这种手法的运用大约是为了避开成人世界的遮蔽,使小说的品格更为纯洁吧。

4.

关于宁夏的文学尤其是宁夏青年作家群以及他们的创作,我还想多说几句话。

众所周知,宁夏的西海固因穷困而甲天下,就物质生活而言,鲜有可道之处;但就精神生活来说,西海固又是一片可资文学创作的沃土。我曾经许多次到西海固,和那里的作者交流谈心,倾听他们的几多诉说,从生活到创作。和他们一样,我有时觉得欣慰,欣慰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作家可以写出有深情的作品;有时又觉得辛酸,辛酸的是同样是我们的父老乡亲,却在这样一片贫困的土地上终日劳作,物质的收获甚微。但是,他们生活得很清洁,很安详,很认真,很严肃,内心深处有一种“静”的力量。也许就是这种“静”的力量,终于催生了灿烂的文学之花朵,向着大地和阳光绽放。

于是,这样一种现象和局面出现了:在宁夏青年作家群里,出自西海固的作家占了一半还要多。这绝不是偶然的,是厚积而发的必然结果。

多少年来,我们对宁夏的认识形成了这样的概念:地处偏远的西北内陆,经济欠发达,社会发展滞后,尤其是西海固地区,

以贫困落后和苦难而著称,等等。然而,正是在这样的土地上,却持续地生长出了一片文学之林,由“三棵树”到目前葱郁的树林,由寂静而芬芳,终于营植出一道亮丽的文学景观。由此看来,就文学创作乃至文化而言,比较一个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,会出现某种不平衡的现象。宁夏的作家大多出身农家,根植和成长于这片黄土地,对劳动者怀有深深的爱和同情,对生存的艰难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悟,自然、乡土、生命三位一体。其二,与作家的心灵复杂程度有关,敏感、警觉、智慧,同时又是那么的本分、朴实、执著和坚韧。甚至包括对因为社会转型而产生的困惑,宁夏的作家都会表现出一种宽容,将此纳入自己独特的逻辑理解。

正是宁夏这片充满神奇、积淀厚重的边塞大地,为宁夏文学的生长和繁荣提供了丰富的土壤,养育了几代作家,让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从这里满怀深情地出发,热烈地奔向文学的崇高殿堂,不断向世人奉献出植根大地的,夹带着泥土芳香的,同时又是关注社会、关注生命意义的精品力作。也有人说,宁夏作家的创作过于迷恋“苦难”,写苦难太多,写乡村太多,似乎有一个总是摆脱不掉的情结。这话虽然有一定的道理,但并不全面。宁夏的作家都怀有一种宗教的情怀,他们以虔诚的姿态对待写作,因此在他们的文学叙述中更多地流露善意,少有疾恶如仇,自然、土地、人民、生命,这些足以令我们敬畏的内容,就成为他们书写的主要对象。在这个问题上,我更愿意赞同这样的看法:相对于那种缺乏真实感和现实感,表面上却又是绚丽的消极写作方式,宁夏作家的创作是诚恳的,是厚实的,尽管有一些沉重,却有着道德上的纯洁性和宗教般的神圣性。他们不仅仅是在“出卖”西部的荒凉,而是在西部荒凉表象下寻找人类精神的丰富性。

要想了解或者是真正理解一个作家,最有效的方法是阅读他们的作品。道理也许很简单,这就是,小说(包括其他文学作品)带有作家的表情,这种表情其实是非常复杂的。因为他们各自的历史记忆、生活经验、生命感悟和言说方式的不同,又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。作为读者,我欣赏这样的小说,就是希望作品中真善美的东西像一盏灯、一把火,将所有的黑暗都驱赶走,让人性的光芒照亮天空和大地。

(本文作者系宁夏文联副主席、《朔方》杂志主编)